

目 录

西藏阿里札达县玛朗墓葬 M1 动物遗存分析与研究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札达县文化和旅游局 / 1

西藏林芝察隅县塔玛岩画调查简报

..... 西藏大学艺术学院 察隅县文化和旅游局 / 54

西藏林周彭江沟崖壁朱书题记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夏吾卡先 / 65

唐宋元明清时期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 巴桑旺堆 / 79

寂怒百尊曼荼罗的起源与形成 旦知才旦 / 104

塔波寺和阿契寺连珠纹形式传统辨析 易晴 / 133

15 世纪“蒲甘上师”汉藏圣地朝觐史实考 王诗晴 / 153

阿里新发现的藏文刻本《北斗七星经》——兼论该经在元以来的多语种翻译、

流传及多民族交流 熊文彬 廖旻 / 167

交往交流交融史视域下的西藏鼻烟和鼻烟壶 陈强强 / 207

混合性图像：青藏高原的佛教肖像与摄影技术（英文）..... 柳钰媛 / 230

吴忠信进藏与民国时期采玉勋章制度在西藏地方实施的历史背景	尼玛仓觉 / 265
川藏公路沿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状——基于民族心理距离和族际关系嵌入 的定量考察	谢伟民 卓玛群措 / 283
汉藏就业群体择业倾向的差异及行业区隔研究——以拉萨市俄杰塘社区为例	徐君 刘超凡 / 301
18 世纪早期欧洲天文著作的藏文翻译	洛桑云丹 著 傅晓莉 才让环公 译 / 315
摘要	/ 333

Table of Contents

Analysis and Study of Faunal Remains from Tomb M1 at Manam, Tsada County of Ngari Prefecture, Xizang	1
<i>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s of Xizang</i> <i>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at Sichuan University</i> <i>Culture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Tsada County</i>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ama Petroglyphs in Chayu County, Nyingchi City of Xizang	54
<i>College of Art, Xizang University</i> <i>Culture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on of Chayu County</i>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Cliff Medicinal Inscriptions in Pengjiang Valley, Xizang	65
<i>Shawo Khacham</i>	
A Study on the Routes Connecting Xiz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79
<i>Basang Wangdui</i>	
A Study of the Zhi Khro Mandala and Its Origins	104
<i>Tamdrin Tseten</i>	
Analysis of the Pearls Roundel Motifs in Tabo and Alchi Monasteries	133
<i>Yi Qing</i>	

Research on the Pilgrimages of "Bagan Guru" to the Han-Tibetan Holy Sit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Wang Shiqing</i>	153
The Newly Discovered Tibetan Xylograph of <i>The Sutra of the Seven Stars of the Northern Dipper</i> in Ngari — With a Discussion on Its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Circulation, and Ethnic Exchanges Since the Yuan Dynasty <i>Xiong Wenbin and Liao Yang</i>	167
Tibetan Snuff and Snuff Bott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i>Chen Qiangqiang</i>	207
Hybrid Images: Buddhist Portraiture and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on the Tibet Plateau <i>Liu Yuyuan</i>	230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rder of Propitious Jade System in Xizang and Wu Zhongxin's Miss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yima Tshanchod</i>	265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ic Communica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long the Sichuan-Xizang Highway — A Quantitative Study Based on Ethnic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Inter-ethnic Embeddedness <i>Xie Weimin and Zhuoma Quncuo</i>	283
Differences in Career Orient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Employee Groups — A Case Study of Ojietang Community in Lhasa <i>Xu Jun and Liu Chaofan</i>	301
The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Astronomical Works into Tibetan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i>Lobsang Yongdan</i> Chinese Translation by <i>Fu Xiaoli and Tsering Palgon</i>	315
ABSTRACTS	333

唐宋元明清时期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

巴桑旺堆

内容摘要：研究历史上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此研究成果丰硕，但不同时期进出西藏的具体路线仍有进一步考证和对比研究的必要。本文拟挖掘更多的珍贵文献，尤其是藏文史料，结合汉文史料和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遗迹，对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西藏与中原的通道进行梳理，确认其具体走向和途经地点。本文中唐代唐蕃古道的研究主要依据资料以汉文文献为主，并结合考古发现。宋元明三朝时期西藏与中原的通道研究依据的资料以藏文文献为主，并参考汉文文献。清朝时期的通道研究以汉文文献为依据，并结合实地考察。唐宋元明时期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在西藏境内经藏北、芒康或江达，过金沙江，再前往中原，不曾发现翻越唐古拉山的记载。清朝时期新形成青藏道和川藏道，成为连接西藏和中原的两条重要交通线路，青藏道从藏北或青海翻越唐古拉山进出西藏，川藏道繁忙于青藏道。

历史上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可被视作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通道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学术话题。对此，中国学者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学界受益良多。即便如此，对于不同时期西藏与中原之间具体的交通路线、途经地点等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需要发掘更多的珍贵史料，尤其是藏文史料。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唐宋元明清时期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提出一些拙见，不当之处，望学界

同仁指正。

一、关于唐蕃古道

研究唐蕃古道，涉及讨论的有四个问题。（一）关于研究唐蕃古道依据的资料。（二）何谓唐蕃古道，即唐蕃古道如何定位。（三）唐蕃古道的正式形成。（四）唐蕃古道的走向，重点是研究涉藏地区唐蕃古道的走向。

（一）研究唐蕃古道依据的资料

研究唐蕃古道，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汉文史料中的相关记载，二是今西藏和四川、青海涉藏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历史文化遗迹。汉文史料主要有道宣所著《释迦方志》，李吉甫所纂修的《元和郡县志》以及《两唐书地理志汇释》《新旧唐书·吐蕃列传》《册府元龟·外臣部》和收录在《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中刘元鼎所撰《使吐蕃经见纪略》。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遗迹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宗嘎“大唐天竺使出铭”¹、昌都市察雅仁达吐蕃摩崖石刻²、昌都市芒康吐蕃摩崖石刻³、四川石渠洛须镇照阿拉姆吐蕃摩崖石刻⁴、青海玉树贝廓吐蕃摩崖石刻⁵、青海玉树勒巴沟吐蕃摩崖石刻等⁶。另外，藏文史籍《柱间史》《西藏王统记》等对唐蕃古道只有极其简略的记载，民间涉及文成公主途经的传说流传于今青海玉树、西藏芒康、察雅等地。

- 1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7）：619-623；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1）：37-50；巴桑旺堆：《吐蕃历史文献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65-77。
-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6）：7-14；巴桑旺堆：《关于仁达吐蕃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中国藏学》2017（2）：50-65。
- 3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县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昌都芒康县旅游局：《西藏芒康嘎托镇新发现吐蕃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2017（1）：233-251。
- 4 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3）：26-31。
- 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玉树贝廓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青海玉树大日如来佛堂西侧崖壁摩崖石刻及线刻佛塔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2019（1）：1-68，69-101。
- 6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2017（1）：63-94，95-147，148-163。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92-126。

（二）何谓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近代以来学术界通行的一个名称，是指公元7世纪正式形成的连接唐朝和吐蕃的交通路线，这一路线之后再从吐蕃出境，通向泥婆罗（今尼泊尔）和天竺（今印度）。关于唐蕃古道的功能或者定位，首先是官道，是唐朝、吐蕃官方使者、信使往来的通道。其次是商道，唐朝、吐蕃之间繁荣的经济贸易往来得益于唐蕃古道。再次是求法、传法之道，唐朝、吐蕃、天竺多人通过唐蕃古道求法、传法。第四是和亲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泥婆罗公主沿着这一通道远嫁吐蕃。1985年笔者参加在新疆召开的敦煌吐鲁番学术研讨会时，著名学者季羨林教授在会议主题报告中把唐蕃古道称为“高原丝绸之路”。

（三）唐蕃古道何时正式形成

根据藏文史籍记载的历史传说，大约5世纪悉补野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聂赞（ལྷ་མོ་དོ་རི་སྐྱེན་བཙན）时有印度班智达洛森措（སློ་ལེམས་འཚོ）和译师黎提斯（ལི་ཇེ་ལེ）两人曾到悉补野雅隆地方传法，因时机未到，传法没有成功⁷。629年，松赞干布即位后派遣吞弥桑布扎（ཐོན་མི་སལྷཱ་ཏ）等多名藏族子弟前往印度留学⁸，可以说早在悉补野时期，或吐蕃王朝初期，吐蕃与泥婆罗、天竺之间已经有通道存在，虽然史籍未记载其具体走向。

唐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登上皇帝之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开启了大唐宏伟的历史篇章。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第一次派遣使者到唐朝。同年，唐太宗派冯德遐出使吐蕃，这是见于正史的吐蕃与唐朝之间首次发生关系⁹。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从此青藏高原与中原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一条自长安出发，抵达吐蕃腹心地区的唐蕃古道正式形成。终唐一代，唐蕃古道上既有唐朝、吐蕃的官方使臣频繁往来，也有求法的唐朝沙门、传法的天竺高僧远途跋涉，而来自唐朝与吐蕃的商旅更是络绎不绝，古道呈现出繁忙的景象。

（四）唐蕃古道的走向

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¹⁰河源之地，即吐谷浑王诺曷钵之都伏俟城（地处青海湖西岸）。唐使王玄策于贞

7 郭·循努白：《青史》（藏文，上册），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64。

8 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66。

9 《旧唐书》第16册，卷196《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1。

10 《旧唐书》第16册，卷196《吐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1。

观十七年（643年）、贞观二十一年（649年），显庆三年（658年）三度经唐蕃古道出使天竺。从王玄策勒石宗嘎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表明，宗嘎之地时属小羊同之境，而王玄策是从今吉隆县出境赴天竺。

根据唐宪宗宰相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唐蕃古道途经今陕西、甘肃和青海，具体的路线是长安、陇州、秦州、渭州、武州、兰州、河州、鄯州¹¹。陇州在唐代辖境包括今陕西千河流域及甘肃华亭县境。秦州即甘肃天水，唐代辖境包括今甘肃定西、清水县西、青海贵德以东。渭州又名陇西郡，唐代辖境包括今甘肃陇西县、定西等¹²。武州位于今甘肃武都县东南¹³。河州即今甘肃临夏。鄯州即今青海西宁、湟中、乐都一带。

又根据唐道宣于永徽元年（650年）所纂《释迦方志》第三遗迹篇记载，唐蕃古道鄯州以西路段的地名有鄯城、承风戍、青海、吐谷浑牙帐、白兰羌、多弥国、苏毗、敢国、吐蕃国等。此处鄯城为今西宁，承风戍为今青海化隆县境内一地名。青海即青海湖，吐谷浑牙帐即青海湖西岸吐谷浑王所居地伏俟城。白兰羌，据学界考证位于吐谷浑西北，唐贞观年后纳入吐蕃辖境。多弥国学界普遍认为即为敦煌古藏文文书 P.t.1288 多次出现的多麦（མདོ་མེད་），苏毗似乎指今青海玉树一带，敢国学界有不同指认，还未有定论。吐蕃国即指吐蕃腹心地区。

唐长庆二年（822年），唐会盟专使大理卿御史大夫刘元鼎出使吐蕃，撰写了《使吐蕃经见纪略》。根据《纪略》，刘元鼎经武州、兰州，抵达龙支城，而后经石堡城、赤岭、闷惧卢川、逻娑川、臧河、悉结罗岭、麋谷、抵达赞普夏牙¹⁴。此处龙支城位于今青海民和县东南。石堡城，又名铁刃城，仅距赤岭20里，赤岭即为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而后抵达吐蕃境内，经闷惧卢川、逻娑川、臧河、悉结罗岭、麋谷、抵达赞普夏牙。闷惧卢川、悉结罗岭、麋谷3处，今无从考证。逻娑和臧河指今拉萨和拉萨河，赞普夏牙指822年，吐蕃彝泰八年唐蕃会盟之地，即唐蕃会盟碑东面盟辞所言“拉萨东哲堆蔡”（ལྷ་སའི་ཤར་ཕྱོགས་ལྷ་སྟོན་ཚལ་）¹⁵。此地位于今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加玛乡境内，是松赞干布的出生地。刘元鼎是经兰州、湟源、逻娑，而后抵达赞普夏牙。但从赤岭如何抵达逻娑，途经哪些重要交通节点，在《使吐蕃经见纪略》中没有记载。道宣的《释迦方志》

11 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08-129。

12 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19。

13 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2002：323。

14 《使吐蕃经见纪略》，载范学宗、吴逢箴、王纯洁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237-240。

15 王尧：《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7。

记载，唐朝派使者往印度，经河州，抵达鄯州，谓此路为东道¹⁶。由此可知，从长安（今西安）经河州（今甘肃临夏），或经兰州均至鄯州。但从唐代文献来看，入吐蕃使者多经河州，如河州炳灵寺留有唐开元年间唐使崔琳出使吐蕃时的题记。

《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及唐蕃古道从牦牛河到赞普牙帐之间的多个地名，如牦牛河、渡藤桥、列驿、截支桥、婆驿、大月河、悉诺罗驿、鹞莽峡、野马驿、突录济、莽布支庄、汤罗叶遗山等。此处的牦牛河当为玉树通天河，对此学界有共识。汤罗叶遗山疑是今西藏当雄境内的唐古拉山，赞普牙帐即为拉萨唐蕃会盟举行地。但是对渡藤桥、列驿、截支桥、婆驿、大月河、悉诺罗驿、大速水、鹞莽峡等位于何地，学界虽进行过多视角的探索，包括实地踏勘，提出过一些意见或观点，如日本学者佐藤长在其《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对玉树至唐古拉山口的考察¹⁷。但这些意见或观点未有充足的旁证，可备一说。

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译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列举了唐蕃古道途经的地名：鄯城、大散官、多弥道、苏昆、拉里、吐蕃、小羊同、咀仓法关、末上加三鼻关、泥婆罗、毗舍离¹⁸。此处鄯城为今西宁，大散官位于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多弥道即如前所述指多麦，当指今青海安多地区，苏昆疑指苏毗境内某一地（似乎指玉树一带，时属苏毗）。拉里不知为何处，足立喜六认为即今嘉黎（那曲市嘉黎旧县城），但缺乏佐证。吐蕃指吐蕃腹心地区。小羊同¹⁹，王玄策指认是今日喀则市吉隆县城宗嘎一带，咀仓法关和末上加三鼻关两处不知指何处，其地望似乎在今中尼边境西藏吉隆县境内。泥婆罗即今尼泊尔，毗舍离即为古印度地名，又称吠舍里，为广博、庄严之意，藏文称央巴坚（ཡངས་པ་ཅན་）。

从考古发现的吐蕃历史文化遗迹来看，在今西藏东部昌都市察雅仁达、芒康嘎托，以及四川丹廓（今石渠县），青海玉树（今玉树贝廓、勒巴沟）等地发现了众多吐蕃摩崖石刻造像、题记和经文，其中察雅仁达和玉树贝廓两处是吐蕃人和唐人联合组成的团队镌刻的²⁰。

藏文史料中玉树贝廓一带被称为丹玛（དང་མ་མེད་）。丹玛指以丹廓（དང་མ་མེད་ 清末把丹

16 道宣撰，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

17 [日]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8：139-161。另见吴均：《自截支桥至悉诺罗驿唐蕃古道的走向——对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之五》，《中国藏学》1988（2）：116-122。

18 转引自巴桑旺堆：《吐蕃历史文献研究论集》，2018：76。

19 唐代汉文史料中有大羊同、小羊同之说，藏文中羊同（即象雄）作为地名有上中下之说。

20 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2011：92、103。

廓译作邓柯，下文称邓柯）为中心的金沙江两岸，包括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玉树一带。藏文史料只极为简略提及丹玛一地。《西藏王统记》记载：“此时，公主与吐蕃使臣，已抵达丹玛山崖处。在此地，公主等候‘论’（禄东赞）一个多月。期间在岩石上镌刻了一尊高7肘高的弥勒像以及经文普贤行愿王经。”²¹《柱简史》也有相同的记载²²。两部藏文史籍所言丹玛山崖上镌刻的佛像和经文，即指玉树贝廓岩壁上的摩崖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像²³，经文是普贤行愿王经。《西藏王统记》记载的所谓佛像和经文是文成公主所刻一说是民间流传的附会之说。事实上，玉树贝廓摩崖造像和题记以及经文是在赤德松赞（འཇིགས་ལྷོ་བཟུང་། 764—815年）赞普执政时期（799—815年）的狗年，即藏历火狗年（806年）由比丘大译师益西央主持镌刻的²⁴。此年比文成公主入吐蕃之年，即贞观十五年（641年）晚了165年。若说镌刻佛像和经文的丹玛一地与文成公主有关系的话，当年文成公主沿着唐蕃古道远嫁松赞干布时极有可能路过此地。西藏东部芒康、察雅和青海玉树等地民间流传着文成公主途经的传说，巧合的是以上地区遗存的吐蕃摩崖石刻和文字，虽不是文成公主所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但能够印证唐蕃古道是途经芒康、察雅、玉树等地。

综上所述，唐代连接吐蕃与中原的通道——唐蕃古道的基本走向是从吐蕃腹地，经西藏察雅、芒康，四川邓柯、青海玉树通往中原。若断言唐蕃古道是经青海玉树，翻越唐古拉山，直接抵达吐蕃逻娑、雅隆的话，为何这条线路上至今既未找到吐蕃石刻之类的历史文化遗迹，又没有文献依据和民间传说流传？

二、宋朝时期

841年吐蕃赞普赤祖德赞（འཇིགས་ལྷོ་བཟུང་། 806—841年）被杀，即位的末代赞普达磨（བཟུང་པོ་འཇིགས་ལྷོ་བཟུང་། 799—842年）灭佛，869年爆发平民暴动，吐蕃政权随之崩溃，吐蕃社会陷入了长达四百年的各地方势力分裂割据的时期，此时，中原地区正处于五代十国和宋朝时期。

宋朝时期吐蕃本土即西藏地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似乎陷入了停顿状况，然而这一时期从西藏地方经今四川、青海涉藏地区前往中原地区的通道依然存在。何

21 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1981：122。

22 觉沃阿底峡发掘：《柱间史》（藏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185-186。

23 当地百姓称此处为“公主庙”。

24 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2011：105。

与阔端会晤²⁸。

藏历第四饶迥木龙年（1244年），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ཕྱག་ན་ལོ་ལྷེ། 1239—?）离开萨迦寺，踏上了前往凉州的路途。经过三年的跋山涉水，抵达凉州。藏历火羊年（1247年），萨迦班智达与阔端在凉州举行会谈²⁹。这次凉州会谈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会谈，从此西藏地方正式成为元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区域³⁰。藏历铁猪年（1251年）十月十四日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享年70岁。

萨迦班智达途经哪条路线赴凉州，藏文史料诸如《萨迦世系史》等中没有详细记载。根据近年出版的《芒巴噶举传记汇编》一书，萨迦班智达应是途经芒康（今西藏昌都市芒康县）赴凉州的。“第四饶迥木龙年（1244年），萨迦班智达叔侄（萨迦班智达和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前往康区时，曾被迎请到神圣的‘雪寺’（ཤོ་དགོ་མ། 芒康境内），受到了四千余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³¹。由此可知，这条路线的基本走向是从萨迦出发，经当雄、那曲、索县、丁青、昌都、芒康，然后过金沙江，再经四川邓柯、青海玉树前往凉州的。

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时年17岁的侄子八思巴成为萨迦教派的新领袖。八思巴虽年轻，但天资聪慧，佛法知识渊博，通晓五明。元宪宗三年（1253年），留在凉州的19岁的八思巴应忽必烈的邀请到六盘山与之会晤。会晤后，八思巴备受忽必烈的崇信。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³²。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设置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以及“兼治吐蕃之事”的专门机构总制院，任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³³。至元七年（1270年），八思巴升号为帝师，获封“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³⁴

八思巴自受忽必烈尊崇以来，尤其任国师、帝师以来，在元上都、大都居住多年，一方面为皇帝和皇室成员讲经说法，祈求福寿，佑国久安。另一方面，作为朝廷管理总制院（后为宣政院）命官，管理藏族地区政教事务尽职尽责。其间，八思巴几次来往于中原与西藏之间。

28 昂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1986：118；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26。

29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2016：32。

30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2016：31。

31 《芒巴噶举传记汇编》（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108。

32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2016：53。

33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2016：177。

34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2016：69。

藏历第四饶迥木兔年（1255年），八思巴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从聂塘巴·扎巴森格（ཉེ་ཐང་པ་གཤམ་པ་སིང་གེ）、觉丹巴·索南坚赞（རྫོག་དན་པ་བསོད་ནམས་བྱུལ་མཚན）、雅龙巴·降秋坚赞（ཡར་ལུང་པ་བྱང་ཚུབ་བྱུལ་མཚན）3位高僧尊前授比丘戒。次年，藏历火龙年（1256年）八思巴从元上都返回西藏，途经东部芒康境：“火龙年上师返回西藏，在左都乃萨寺（གཙོ་མདོ་གནས་གསར་དགོན། 芒康境内）讲经，大近侍兼弟子敦村（སྟོན་ཚུལ།）为首，恭请上师讲经，上师仅一天之内讲授1500部经函。地方信徒捐献了丰厚的贡品，而后上师返回乌思藏。”³⁵

此后八思巴再赴元都，藏历第四饶迥木鼠年（1264年），八思巴和弟弟恰那多吉受命返回萨迦寺，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³⁶。次年，八思巴回到萨迦。藏历火兔年（1267年），八思巴离开萨迦寺又赴元都。1271年夏，八思巴又从元都抵达临洮（今甘肃临洮），此次出居临洮长达6年之久，其间著书立说，讲经说法。至元十二年（1275年，藏历第五饶迥木猪年）八思巴离开临洮，与元太子真金一同前往萨迦寺时，又途经芒康，“第五饶迥木猪年中秋月，法王八思巴从理塘抵达芒康，朝拜了然堆大日如来殿（今芒康县邦达乡境内），其附近建有一座名为贡噶林的小寺。”³⁷次年，八思巴一行回到萨迦寺，第三年，即藏历火牛年在曲弥（ཚུ་མིག། 今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米乡）举行法会，史称曲弥大法会。关于这次法会，《萨迦世系史》载“由皇子真金为施主，法王八思巴向七万余僧人和民众……每人布施金一钱。”³⁸而《智者喜乐》称“皇太子真金向七万余僧人和民众，每人布施金一钱。”³⁹

综合藏文史料，八思巴进出西藏前往中原时所选择路线的走向是从萨迦寺出发，经藏北，再往东，经西藏东部康区察雅、芒康等地，再经四川巴塘、理塘、德格、邓柯，青海称多⁴⁰，甘肃河州或临洮，前往元都。这一线路与唐蕃古道的走向基本相同。藏历铁龙年（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圆寂，年仅46岁。

（二）元朝在藏地所设驿站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方便元朝官员、信使来往方便，也为

35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智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328。

36 陈庆英、张云、熊文彬主编：《西藏通史·元代卷》，2016：56-57。

37 《芒巴噶举传记汇编》（藏文），2006：121。

38 昂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1986：215。

39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智者喜乐》（藏文），1985：329。

40 “称多”在藏语中意为万人聚集地，传说八思巴在此地讲经，曾有信徒万人前来聆听。

了给西藏高僧、官员赴元都、中原提供便利，依照中原已有的驿站，在中统年间派遣官员在乌思藏（དབུས་གཙང་）、朵甘思（མདོ་ཁམས）、朵思麻（མདོ་མུད）境内设置了 27 处驿站。“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七处大驿站。若分别叙述，朵思麻站七处大站，朵甘思九处大站，在乌思藏十一处大站。”⁴¹ 此处乌思藏主要指那曲市索县以上地区，包括今日喀则市、拉萨市、山南市辖境；朵甘思即指今那曲市巴青县辖境、西藏昌都市辖区、四川甘孜州大部、青海玉树州等地区；朵思麻指今青海（除玉树州外）、甘南地区和四川阿坝州一部分地区。

15 世纪由达仓宗巴·班觉桑布（སྟག་ཚང་ཚོང་པ་དཔལ་འབྱོར་བཟང་པོ）所著史学名著《智者喜乐》和《如意珍宝》对乌思藏 11 站的地名有完整记载，朵甘思 9 站只记载了 2 站地名，而朵思麻 7 站中只记录 1 站地名。乌思藏 11 处驿站中藏地有 4 站，乌思（དབུས）地区有 7 站。藏地 4 站是仲达（གྲོ་མ་མདའ）、塔尔龙（དར་ལུང）、聪堆（ཚོང་འདུས）、达（སྟག）。以上藏地 4 站的具体地望是仲达站，即为萨迦站，因萨迦位于仲曲（གྲོ་མ་ཚུ）河下游，故有仲达之称。塔尔龙站位于今日喀则市萨迦县雄玛乡德庆孜村，聪堆站位于著名的夏鲁寺附近，今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甲措雄乡从堆村。达站即为达仓（སྟག་ཚང）之站简名，为今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土布加乡达仓村。乌思地区 7 站是恰瓦（གྲུ་བ）、管萨（དགོན་གསར）、贡（རྟོང）、夏颇（ཤ་པོ）、孜巴（ཚེ་བར）、夏（ཤག）、索（སོག）⁴²。乌思地区 7 站中贡、夏颇、夏、索 4 站的地望可确认。贡站，即为贡塘站，位于今当雄县公塘（རྟོང་ཐང）乡境内。夏颇位于当雄和那曲分界线以北那曲市色尼区香茂（ཤ་མོང）乡境内。藏历第六饶迥土狗年（1358 年），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ཀམ་པ་ཚོལ་པའི་རྗེ། 1340—1383 年）前往元都时，翻越当雄和那曲之间的分界山口交孜拉（ལྷོག་ཚེ་ལ）山口后，受到夏颇地区民众的热诚欢迎⁴³。夏站即为设在夏曲卡（ཤག་ཚུལ）一地的驿站，位于今那曲市比如县夏曲卡乡夏曲哇村。索站设在今那曲市索县县城所在地亚拉（སོག་གཡག་ལ）镇。余下恰瓦、管萨、孜巴 3 站确切位于何处不得而知，但根据驿站线路走向当位于当雄县和索县之间。以上乌思地区 7 站地处藏北，传统地理范围中不属于乌思地区，但之所以称作乌思驿站，原因有两点：一是元代乌思 7 处驿站支应的差役乌拉皆由乌思万户府承担。如当雄境内的公站差役乌拉由乌思万户府亚桑支应。二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忽必烈在乌思

41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智者喜乐》（藏文），1985：302-30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如意珍宝》（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40。

42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智者喜乐》（藏文），1985：302-30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87-188。

43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958。

藏、朵甘思、朵思麻（又脱思麻）地区分别设立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者司都元帅府、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等 3 个行政区域⁴⁴。当时索站以上地区属于乌思藏，索站是乌思藏和朵甘思的分界线⁴⁵。

遗憾的是，在《智者喜乐》和《如意珍宝》两书中朵甘思 9 个驿站只记录了 2 个驿站的名称：改日（གཏེ）和廓白（གོ་དཔེ）。经考证，改日当设在今那曲市巴青县高口乡改日塘村（གཏེ་རི་ཐང）一带。藏历第六饶迥土狗年（1358 年），四世噶玛巴赴元都时途经改日驿站⁴⁶，而后翻越恰拉（ཆགས་ལ 今巴青县境内，与昌都市丁青县的分界山口）前往噶玛寺（ཀམ་དགོན 噶玛噶举派祖寺，一世噶玛巴所建，位于今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嘎玛村）。廓白一地虽然具体地望不详，似乎亦在巴青县境内。

朵思麻 7 个驿站中《智者喜乐》只记录了 1 站名称，即朵思麻最后一站卡曲热卡（གཟུ་རབ་ཁ）⁴⁷。卡曲是河州音译，卡曲热卡意即河州某河流（洮河或大夏河）渡口，陈庆英研究员在《汉藏史集》中译为“河州的热布卡”⁴⁸。唐代河州是陇右道下辖的一个州府，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唐肃宗宝应元年（762 年），吐蕃攻陷河州，敦煌古藏文文书 P.t.1288 载：藏历虎年（762 年）“尚结息与尚悉东赞等越凤林、铁桥，率大军攻克临洮军、成州、河州等众多唐朝廷城堡。”⁴⁹河州一直到 848 年张议潮收复河湟十一州为止都处在吐蕃统治之下。宋代复置河州，元改河州路。藏文史籍云，元代河州一地乃是忽必烈赠送给八思巴的供奉地⁵⁰，又是元代藏地三个行政区之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所在地，故朵思麻的最后驿站设在河州。至明代河州一带仍是吐蕃后裔头人的领地，明永乐五年（1405 年），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ཀམ་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 1384—1415 年）赴南京时，送别队伍送至河州后便返回，余下路途由永乐帝命明朝地方官员接送⁵¹。

从元朝在三大传统藏族地区所设驿站的地理位置来看，设立的驿站线路的走向是从萨迦寺出发，经当雄、那曲（老城区）、索县、巴青、昌都、邓柯、玉树、丹底⁵²（དན་ཁྱིག 青海化隆县境内）、甘南，而后抵达河州。

44 参见昂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1986：156-16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智者喜乐》（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274-276。

45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如意珍宝》（藏文），2007：142。

46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958。

47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如意珍宝》（藏文），2007：142。

48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1986：170。

49 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57。

50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如意珍宝》（藏文），2007：142。

51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1003。

52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1986：168。

元朝在藏地设置驿站的过程中，八思巴作为元朝国师和帝师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八思巴的全力支持下，忽必烈所派官员答失蛮等人仿照中原驿站制度，从乌思藏的萨迦至朵思麻的河州设立了 27 处驿站，接上中原驿站后，前往元上都、大都和中原其他地区的通道可谓畅通无阻。

（三）二世、三世、四世噶玛巴赴元都时进出西藏路线

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ཀམ་པཿ། 1204—1283 年）、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ཀམ་པར་བྱང་ལྗོངས། 1284—1339 年）、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ཀམ་པ་རྩོམ་པའི་རྩོམ་ལྗོངས། 1340—1383 年）三人应元朝皇帝之请先后赴元都。根据藏文文献记载，通过对三位噶举派黑帽系高僧进出西藏路线的研究，对元代西藏与中原通道的走向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可弥补以往学界忽略的许多藏文史料中的宝贵信息。

忽必烈尊奉八思巴为国师，同时对噶玛噶举派的首领亦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当忽必烈得知二世噶玛拔希极具法力，名震藏地时，派金册使者邀请噶玛拔希前往中原传法。噶玛拔希的“拔希”系蒙古语，意为轨范师。藏历第四饶迥木兔年（1255 年），噶玛拔希以 52 岁高龄取道朵甘思赴元都。《洛隆教法史》记载：噶玛拔希“经康区前往蒙古地区”，“从乌思向东，经索（今索县）再向着蒙古地区上路”⁵³。此处“康区”即为朵甘思，位于西藏东部地区，“蒙古地区”即指中原。以上记载表明噶玛拔希是从乌思地区出发，经今索县，再经东部康区前往中原的。藏历火龙年（1256 年），噶玛拔希抵达上都，受到蒙古王室和臣民的崇信。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优礼有加，拜为上师，提出要他永留皇宫传法弘佛的要求。噶玛拔希谢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因为他深知，此时在蒙古汗室内部权力之争十分严重。

1259 年，蒙哥大汗去世，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之间为争夺汗位发生战争，最终阿里不哥失败被囚。次年，忽必烈登大汗位，年号为中统，尊奉八思巴为国师。这时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从原先的优礼变成了极大的仇视。其主要原因是忽必烈听信谗言，认为噶玛拔希与其政敌阿里不哥关系密切，于是把噶玛拔希放逐到南方大海之边⁵⁴。

藏历第四饶迥木鼠年（1264 年），噶玛拔希终于从忽必烈的都城中都启程，踏上了回藏的路途。途经噶玛寺、藏北，来到当雄境内交孜拉山口⁵⁵时，受到乌思藏官员、民

53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4：236、241。

54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藏文），1994：237。

55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901。

众的热诚欢迎。藏文文献对噶玛拔希赴元都时进出西藏路线的记载极为简略：出藏东行康区。返藏时途经噶玛寺和当雄境内的交孜拉山口。藏历水羊年（1283年）九月三日，噶玛拔希安然圆寂，享年80岁。

藏历第六饶迥铁羊年（1331年），元文宗图帖睦尔派使者带着诏书和金印前往楚布寺迎请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赴元都。是年十二月，让迥多吉一行赴元都时途经当雄，因大雪所困未能成行，只好返回楚布寺。次年，藏历水猴年（元至顺三年，1332年）二月，让迥多吉经康区芒康⁵⁶，踏上了赴元都之路，但未抵达皇宫前，八月份文宗帝已驾崩，年仅7岁的宁宗即位。十月，让迥多吉一行抵达元都，受到宁宗皇帝及众大臣的隆重欢迎。然而宁宗即位不满两个月就病逝，皇室内发生了皇位继承的争议，拖延数月不决。藏历水鸡年（1333年），妥欢帖睦尔登基，即为元顺帝，年号为元通。

藏历木狗年（1334年）一月，让迥多吉遂向顺帝辞行，六月十五日让迥多吉一行离开元都，返回西藏。途中先是前往五台山朝礼，尔后经噶地（མཱི་ཡུ་ཤུ་ 玉树）、芒康、噶玛寺，于第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抵达当雄，九月回到阔别已久的楚布寺⁵⁷。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的出进西藏路线与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的路线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藏文文献中不见噶玛拔希途经芒康的记载。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出藏路线则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路线相同。

藏历第六饶迥火猴年（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元顺帝派金册使者携诏书前往西藏迎请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前往元都。第二年五月若必多吉离开楚布寺，取道北路（即藏北路），踏上赴元都之途。当随行的元金册使者在途经驿站中为若必多吉支派乌拉差役，欲征坐骑时，若必多吉以不忍苦累有情，不扰害于民为由拒收坐骑，并免去各驿站一切应支乌拉差役⁵⁸。六月若必多吉一行经改日驿站（今那曲市巴青县境内），翻越恰拉山，赴噶玛寺⁵⁹，十二月五日抵黄河边，时元朝发生内乱，叛军火烧上都。

藏历第六饶迥土猪年（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若必多吉在赴元都途中转赴甲绒（今四川阿坝州境）、弥药热岗（今四川甘孜州境）等地巡游弘法，宣讲慈悲，劝导消除暴力，平息地方残害百姓之纷争。此时，元帝妥欢帖睦尔又传谕，敦促若必多吉快速赴元都。藏历铁鼠年（1360年）七月十八日若必多吉一行离开弥药热岗，经临洮，再次踏上了赴元都之路。途中专程前往朝礼了萨迦班智达圆寂地幻化寺（今武威市境内）。

56 《芒巴噶举传记汇编》（藏文），2006：129。

57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藏文），1994：242。

58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958。

59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958。

十二月十九日若必多吉一行抵达元大都⁶⁰。此年为顺帝在位的第二十八年。元顺帝对若必多吉的到来极为重视，率皇后及皇室成员拜若必多吉为师，闻习多种佛法。

若必多吉旅居元都3年，为皇室福寿双增经常举行法事，皇帝、皇眷及大臣均敬仰他。藏历水虎年（1362年）一月十四日，若必多吉一行起程返藏，沿途所到之处，成千上万信徒前来拜见。途经宗喀时，若必多吉为一名8岁男孩授戒，取名为贡噶宁布，此男童便是其后对西藏佛教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代佛学大师，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⁶¹。而后若必多吉经丹玛隆塘（邓柯）、噶玛寺⁶²、丁青、当雄，前往乌思。途中抵达噶玛寺后，短暂转赴芒康，从远处朝拜了喀瓦噶布神山（今察隅县擦瓦绒乡境）⁶³。藏历第六饶迥水猪年（1383年），若必多吉圆寂，时年44岁。银制灵塔和金像奉安于楚布寺。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出藏赴元都时在西藏境内的路线与三世噶玛巴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进藏途中经丹玛隆塘（邓柯），过金沙江，抵达噶玛寺，说明此路未曾经过芒康境内。

四、明朝时期

1368年，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伊始，十分重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诏谕乌思藏等地区“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同仁。”⁶⁴尔后在西藏地方先后设置了乌思藏卫指挥使司（后升为都指挥使司）和俄里思（阿里）军民元帅府。同时，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权也发生更替，元朝独崇的萨迦派政权势力被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所推翻，于是明朝对西藏地方采取了与元朝有所不同的治藏政策。一是改元代独尊萨迦一派的做法，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西藏地方有实力的教派领袖封授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大慈法王和阐化王、阐教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法王和教王的名号⁶⁵。二是施行贡市羁縻政策，西藏各地政教首领要向明朝廷贡献牲畜、皮货、药材、藏绒、藏香以及佛教贡品。朝廷回赐给朝贡者丰盛的赏赐。

明朝犹如元朝一样，对西藏地方与中原的交通驿站十分重视，明初鉴于原有的一些驿站处于荒废状态，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帝令西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首领阐化

60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藏文），1994：246。

61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964。

62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967。

63 达察·次旺杰：《洛绒史籍》（藏文），1994：248。

64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史料选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87。

65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59-65。

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དབང་གཉགས་པ་བྱུང་མཚན། 1374—1432年今译扎巴坚赞贝桑布）会同其他僧俗首领，主持复置驿站事宜，同时派人“设立站赤，抚安军民”⁶⁶。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派遣中官杨三保持敕往谕西藏地方阐化王和其他藏地首领，“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归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⁶⁷。如此，西藏与中原之间的交通通道经过多次的修复和增设，“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虑盗贼矣！”⁶⁸驿站的畅通，为往来于通道上的官方使者，前往京师朝拜、献贡的西藏地方高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五世噶玛巴赴南京时出进西藏路线

根据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的藏文传记，通过梳理五世噶玛巴赴南京谒见永乐帝时所经涉藏地区的交通路线，可以与唐宋元时期西藏前往中原的交通路线作一番对比。

五世噶玛巴是噶玛噶举黑帽派著名领袖，明史中五世噶玛巴被称作哈里麻。明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帝特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和僧人智光等人持诏书进藏迎请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诏书中曰：“朕在北方之时，素闻尔之美名，遂有欲一见之心。”⁶⁹此次永乐帝邀请五世噶玛巴赴南京的主要目的是“朕惟愿为皇考、皇妣致祭超度”，即为明太祖朱元璋和马太皇后举行致祭超度仪式⁷⁰。

藏历第四饶迥木鸡年（1405年），年仅22岁的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一行离开楚布寺踏上了赴中原的路程。是年秋抵达索地（索县），冬逗留在纳雪（ནག་ཤོད།今比如县境的又一名称）。第二年七月，至噶玛寺。在噶玛寺短暂逗留后，经江达（今昌都市江达县境），过金沙江，抵达丹玛隆塘，即邓柯，再经河州，抵临洮⁷¹。然后经陕西、湖南、安徽，乘船入长江。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帝得知噶玛巴临近南京，遣附马都尉沐昕前去迎接⁷²。当年十二月，即藏历火猪年元月二十日，五世噶玛巴抵达南京⁷³。

对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的到来，永乐帝十分重视，把得银协巴尊奉为“尚师哈里麻”。抵南京当日，皇帝亲自走出宫门，前去与噶玛巴会晤，并赐礼品。第三天，即藏

66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77。

67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77。

68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史料选辑），1986：89。

69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史料选辑），1986：125。

70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1001-1002。

71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1002-1003。

72 熊文彬、陈楠主编：《西藏通史·明代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48。

73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1003。

历元月二十二日，永乐帝在华盖殿设宴赐见，宴毕，帝亲自送得银协巴至皇宫门，皇子大臣们奉命把得银协巴送至驻锡地灵谷寺。

藏历三月五日，得银协巴在灵谷寺设道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⁷⁴。得银协巴及高徒制作 12 个坛场，从五日至十八日，日日诵经祈祷，举行荐福法事仪轨。

永乐五年（1407 年）三月，永乐皇帝敕封五世噶玛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⁷⁵。从此，历代噶玛巴皆承袭“大宝法王”之封号。同月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及随行门徒赴五台山再建普度大斋，为高皇帝、高皇后荐福。

永乐五年七月，仁孝皇后徐氏崩逝。永乐帝命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再赴五台山为皇后举行法会。得银协巴接旨后，即刻奔赴五台山，于显通寺设大斋为皇后荐福。此次在五台山建大斋为皇后荐福近 4 个月之久，十一月，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一行才得以返回南京。

藏历土鼠年（1408 年）五月，即永乐六年四月，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在中原逗留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决意返回西藏。永乐帝准其归藏，“复赐金币、佛像，命中官护行”⁷⁶。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返藏路线经河州，在今青海境内翻越玛卿山，再经噶玛寺、索地、纳木错（当雄境内），抵达拉萨。五世噶玛巴逗留噶玛寺期间，应芒康、贡觉地方施主和信徒之请，在当地讲经说法⁷⁷。五世噶玛巴出藏和返藏路线与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的路线基本相同。

通过对五世噶玛巴进出藏路线的考察，可知其进出西藏路线从楚布寺至噶玛寺之间基本上沿袭了唐朝、元朝时期的路线，只是从噶玛寺出发后经今昌都市江达县境，过金沙江，抵达丹玛隆塘（即邓柯），而没有经过芒康。本文认为五世噶玛巴进出藏路线是明朝时期西藏通往中原的重要交通线路。

诚然，明代西藏地方有许多高僧频繁进出西藏前往明都或中原，明朝官方使者也多次出使西藏，因此，连接西藏地方与中原的交通路线会有多路。其中途经四川一路是重要的一条线路，明代汉文文献有所记载，“四川地旷山险，扼控西番，松、茂、碉、黎当吐蕃出入之地”。四川境内有成都，经雅安、天全，是“朝贡出入之路”。如格鲁派

74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59。

75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59。

76 熊文彬、陈楠主编：《西藏通史·明代卷》，2016：49。

77 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1986：1002-1003。

高僧释迦也失便是经成都前往南京的⁷⁸。又有经今茂汶、松潘，抵达甘肃临潭，再往京师的路线。明使经四川出使西藏的人员有洪武年间奉旨出使的僧人克新，正德年间的明使刘允等。

（二）茶马交易路线

明朝时期以内地茶布丝绸等物向藏地市易马匹的茶马交易盛行，称之为茶马互市。为此明朝在洮州（今甘肃临潭）、秦州（今甘肃天水）、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四地设立茶马司⁷⁹，由官府直接管理茶马互市。

明代的茶马互市沿袭了宋朝时期的茶马交易。早在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朝设置了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当时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主要来自川蜀，地方官府用雅州所产的茶叶换取藏地的马匹，使民间的零散贸易成为有组织的市易。据《宋史》记载，每年单就官府所得的额定马匹就达两万多匹。茶马互市成为藏汉及西部各民族之间密切交流的纽带，尤其是宋代汉地的茶叶首先满足了西北河湟一带藏族部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从这些藏族部落沿着唐蕃古道把茶叶运往西藏本土。

元代是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世代代居住于草原，生活、军事用马众多，无需依靠茶马交易市场来获得藏地大量马匹。因此，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对民间的茶马交易管理松弛，后来让汉藏民间自行购运，自由互市。

到了明代，通过来往于两地的使者、僧人以及设立驿站等举措，西藏地方与中原之间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茶马交易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由官府制定茶马互市政策，主持茶马交易。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河州司马为例，凡上马匹给茶四十斤，中马三十斤，下马二十斤”。⁸⁰但不同地区马匹换茶的定价有所不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严州茶马司定价为“上马一匹与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驹马五十斤”。⁸¹

明代由于西藏地方茶叶需求数量巨大，以致西藏赴中原使者常用其他物品换取茶叶。如宣德年间，西藏阐化王所遣使者在中原“以朝廷赐物易茶，至临洮，临洮卫疑为

78 熊文彬、陈楠主编：《西藏通史·明代卷》，2016：57。

79 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79。

80 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80。

81 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80。

私茶”⁸²，拘留使者，没收茶叶归库。为此，明廷依河州都督刘昭奏请，命放回使者，退回其茶叶。

虽然藏汉史料中关于明代中原通往西藏的茶马交易路线的具体走向，以及在西藏何地进行茶马交易等均不见记载，但有理由相信唐宋元以来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应是中原茶叶输往西藏的主要路线。

五、清朝时期

随着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方略不断完善、强化，根据政治、军事上的需求，开辟了两条新的连接西藏与中原的交通路线，即青藏道和川藏道。

何为青藏道，何为川藏道？其中青藏道指的是从青海西宁到拉萨（清史称前藏）的路线，川藏道指的是从四川成都到拉萨的路线。

青藏道和川藏道正式开辟于清康熙年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游牧于新疆伊犁一带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ཚེ་དབང་འགྲུག་）派大将策零敦多布（ཚེ་རིང་དོན་གཤམ་）率六千精兵经西藏阿里、藏北草原，突袭拉萨，杀死了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和硕特蒙古首领拉藏汗（1656—1717年，固始汗后裔），而后占据西藏长达三年。康熙皇帝鉴于蒙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不仅严重扰乱了西藏地方秩序，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战争灾难，而且危及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安全。于是，先后从青海和四川两路派大军入藏，进剿准噶尔军队，恢复西藏地方的安宁。

（一）青藏道

藏历第十一饶迥水龙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清顺治帝，达赖喇嘛从拉萨出发，经当雄、拔绒（那曲市色尼区境）、那曲（今那曲市老城区）、巴青（今那曲市巴青县境），然后翻越唐古拉，抵达玉树，过通天河⁸³，再经曲麻莱，越巴颜喀拉山，经扎陵湖畔，前往北京。这是藏文文献中首次见到西藏高僧赴中原时选择翻越唐古拉山的记载⁸⁴，也是青藏道最初通路情形。从此，西藏一些高僧夏天选择这条交通线赴中

82 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73：82。

83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第司·桑杰嘉措：《第五世达赖喇嘛传》（藏文，第一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292-299。

84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第司·桑杰嘉措：《第五世达赖喇嘛传》（藏文，第一册），2013：292-299。

原，或进京。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世班禅喇嘛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进京朝贺时的赴京路线，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北京及中原、蒙古等地的路线⁸⁵均与上述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路线相同。

青藏道正式开辟与清军入藏进剿准噶尔军队有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西安将军额伦特、侍卫色楞率领的清军分别从西宁出发，在玉树汇合后进军藏北征讨准噶尔军队。当清军抵达哈喇乌俗（那曲一带）时，准噶尔军截击清军背后，断其粮饷，相持月余，清军被歼灭，色楞被捕⁸⁶。同时，从四川入藏的清军提督康泰也败亡于拉哩（也写作拉里，即今那曲市嘉黎县）。此次清军从青海第一次入藏的路线虽然沿袭了五世达赖喇嘛进出藏路线，但军事行动遇到了挫败。

鉴于清军第一次入藏的失败，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帝任命皇十四子胤祜（允禵 1688—1755年）为抚远大将军王，命延信为平逆将军，再次率军从青海入藏，同时护送在塔尔寺逗留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ཏཱ་ལའི་བླ་མ་སྔ་མེད་བདུན་པ་བསྐལ་བཟང་མཚོ།* 1708—1757年，清史时称六世达赖喇嘛）入藏坐床。次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抚远大将军王胤祜移驻木鲁乌苏（又称穆鲁斯乌苏，玉树通天河一带），居中调度，延信率2万余清军从木鲁乌苏出发，进入藏北哈喇乌苏，连败准噶尔军，“车零敦多布等援散食绝，力竭势穷”⁸⁷；又见拉萨已被从四川入藏的清军攻陷，便率领余部狼奔鼠窜，逃回准噶尔⁸⁸。是年农历九月十五日，达赖喇嘛安然抵达拉萨布达拉宫坐床⁸⁹。延信所率清军第二次从青海入藏，选择的路线与额伦特第一次入藏路线相同。章嘉·若贝多杰（*ཇུང་སྔ་མེད་པའི་ཚེ།* 1717—1786年）所著《第七世达赖喇嘛传》对青藏道有较多的表述。该书记载七世达赖喇嘛和护送的清军从塔尔寺出发，经扎陵湖畔、鄂陵湖畔，在玉树过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经那曲、拔绒、热振、邦堆（今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而后抵达拉萨⁹⁰。此次清军从青海直接进入西藏标志着青藏道正式形成。从此青海道成为官员、信使、高僧、贡使、商贾来往西藏与中原的一条新的重要交通路线。

根据《西藏志·卫藏通志》载，拉萨（前藏）至西宁路线基本走向是从拉萨出发，经曲果（清史称群科尔，今甘丹曲果，即拉萨市林周县城所在地）、达隆（林周县达隆

85 普觉·图旦强巴慈成丹增：《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藏文，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624-632。

86 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123。

87 孟保撰，黄维忠、季垣垣点校：《西藏奏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13。

88 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2016：131。

89 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2016：132。

90 章嘉·若贝多杰：《第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05-112。

乡达隆村)、当雄、那曲、唐古拉山、玉树等共 38 站⁹¹。再经巴颜喀拉(哈拉)山、东科尔(青海湟源县境),至西宁。从木鲁乌苏(玉树)至西宁,计程 3700 余里⁹²。《西招图略·西藏图考》载:西宁至前藏(拉萨)“共计程四千一百二十里”,又云“约五千里”⁹³。以上计程,在《卫藏通志》诸书中略有不同,仅供参考。

(二) 川藏道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四月十六日,定西大将军噶尔弼率满汉官兵从成都起程,出打箭炉,经理塘、巴塘,抵达察木多(清史又写作叉木多,即昌都)。在察木多噶尔弼汇合由云南都统赵坤所率清军后整队进发,抵达拉里⁹⁴。尔后,噶尔弼在拉里整军经武,预备进攻墨竹工卡一带的准噶尔军队。时工布(今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江达乡)头人阿尔布巴(འཕེན་ལོ་རྒྱལ་པོ་)主动给清军作向导,并亲率 2000 余名工布民军协助清军作战,击败了墨竹工卡一带的准噶尔守军。

八月二十三日,噶尔弼率领清军进驻拉萨后,拉萨和那曲的准噶尔残军遂狼狈经藏北、阿里逃回新疆,西藏地方秩序和人民的安宁生活得到了恢复。阿尔布巴因其所立战功,被清朝授予贝子之衔⁹⁵,不久又升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

此次,噶尔弼率军从成都出发,途中经打箭炉、巴塘,过金沙江,经西藏境内的江卡(芒康)、乍丫(察雅)、察木多(昌都)、类乌齐、洛隆、硕般多(硕督)、边坝、拉里(嘉黎)、江达、墨竹、德庆,抵达拉萨。清朝在清军经过的这些重要交通要道上设置了驿站、塘汛(关卡),并于雍正五年(1727年)基本设置完成。于是沿着这一重要交通路线形成了新的川藏通道。根据《西藏志·卫藏通志》统计,成都至打箭炉 11 站,打箭炉至理塘 8 站,理塘至巴塘 6 站,巴塘至察木多 14 站,察木多至拉里 13 站,拉里至前藏(拉萨) 10 站,共计 62 站⁹⁶。

从此,这条既是官道,又是商道的川藏道异常繁忙。清朝的许多官员诸如钦差大臣、驻藏大臣,以及清军、西藏地方官员通过川藏道来往于西藏地方与中原之间。该道亦作为商道,内地的茶叶、丝绸、瓷器与西藏的土产也通过川藏道进行交易。

91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254。

92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1982:254。

93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27、128。

94 转引自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1986:186。

95 邓锐龄、冯智主编:《西藏通史·清代卷》(上),2016:138。

96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1982:227-240。其他史料中记载的站数不尽相同。

1. 江卡至察木多驿站考

根据《西藏志·卫藏通志》，江卡至察木多计程为 895 里⁹⁷，《西招图略·西藏图考》为 789 里。两地之间包括江卡、察木多在内夜宿驿站有 11 站和打尖地 9 处⁹⁸。夜宿 11 站是江卡、黎树、石板沟、阿足塘、洛加宗、乍丫、昂地、王卡、巴贡、包墩、察木多。此处江卡指今昌都市芒康县嘎托镇境内一地名。1728 年（雍正五年），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勘定西藏与四川的边界，在宁静山（今名芒康山）立界碑，山以东属四川巴塘，山以西属西藏地方⁹⁹，界碑 140 里处为江卡，是进入西藏的第一站。江卡是藏语 རྒྱལ་ཁྱེ་ 之音译。察木多即为今昌都市老城所在地。

江卡至察木多的夜宿驿站 11 站中，江卡、黎树、石板沟 3 处均在今昌都市芒康县境内。黎树又称力黍，距江卡 120 里¹⁰⁰，非藏语地名，噶厦档案中写作 མར་ཁུ་མང，当位于今芒康县城嘎托镇以北约 60 公里处。石板沟亦非藏语地名，噶厦档案中写作 ཉེ་དབར，距下一个阿足塘站仅 80 里。阿足塘、洛加宗、乍丫、昂地、王卡、巴贡等 6 站在今昌都市察雅县境内。阿足塘（ཡ་ཚུར）驿站设在今阿孜乡阿孜村，洛加宗（ལྷོ་རྒྱ་རྫོང）在噶厦档案中另有所指，写作 ར་ཚེ，距阿足站 100 里。乍丫即为察雅，噶厦档案中称驿站设在香堆（བྱམས་མདུན），即今香堆镇香堆村。昂（འགམ）地站即为今刚卡乡嘎木巴村。王卡（མང་དཀར）即为今王卡乡王卡村。巴贡（འབའ་གོང）即为今王卡乡巴岗村。包墩、察木多 2 站今属昌都市卡若区。包墩（སྤམ་ལྗེ），即为今卡若区埃西乡崩德村。

江卡至察木多之间打尖地 9 处，分别是山根、阿拉唐、歌二塘、俄伦多、雨撤、噶噶、三道桥、苦弄山、孟卜。其中山根、阿拉唐 2 处在今芒康县境内。歌二塘、俄伦多、雨撤、噶噶 4 处在今察雅县境内。三道桥、苦弄山、孟卜 3 处在今昌都市卡若区境内。以上地名中除孟卜（མོང་ཕུ）为今昌都市卡若区埃西乡蒙普村外，其余打尖地名具体在何处不得而知。

2. 察木多至拉里驿站考

察木多至拉里之间包括察木多、拉里在内夜宿有 15 站和打尖处 14 处¹⁰¹。拉里为今那曲市嘉黎县拉日村。夜宿 15 站是察木多、浪荡沟、恩达寨、瓦合寨、嘉裕桥、洛隆

97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1982：234-235。

98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1982：87-90。

99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1982：87。

100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1982：87。

101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1982：91-97。

宗、硕般多、巴里郎、拉子、丹达、郎吉宗、阿兰多、甲贡、多洞、拉里¹⁰²。此15站中察木多、浪荡沟2站今属昌都市卡若区；浪荡沟非藏语译名，噶厦档案中写作སྐ་དམའ，距察木多站仅75里¹⁰³。恩达寨、瓦合寨2站今属昌都市类乌齐县，恩达寨（ཇན་མདའ）即为今桑多镇恩达村，瓦合寨（ཕུའོ）即为今瓦合乡瓦合村。嘉裕桥、洛隆宗、硕般多、巴里郎等4站今属昌都市洛隆县。嘉裕桥在藏文中写作འབས་གཡས་ཟམ་པ，位于今马利乡夏叶村，洛隆宗（ལྷ་རོང་ཚོང）即为洛隆旧县城所在地，硕般多（ཤོ་པ་མདོ）即为今硕督镇硕督村，巴里郎（ཐུ་རི་ནང）即为今中亦乡巴日囊村。拉子、丹达、郎吉宗、阿兰多、甲贡、多洞等6站今属昌都市边坝县。拉子（ལྷ་ཅེ）即为今拉孜乡拉孜村，丹达（དྭ་མདའ）即为今草卡乡达达，郎吉宗（རྗམ་རྒལ་ཚོང）即为今金岭乡朗吉岗村，阿兰多（ཨ་ལ་མདོ）即为今金岭乡阿拉多村，甲贡（ལྷགས་གོང）即为今加贡乡加贡村，多洞（རྫོ་ཐོག）即为今加贡乡多托村。

察木多至拉里之间14处打尖地是牛粪沟、麻利、鼻奔山根、曲齿、中义沟、索马郎、边坝、察罗松多、大窝、破寨子、大阪桥、擦竹卡。其中俄洛桥、拉公2处今属昌都市卡若区。俄洛桥（འགྲུ་རོ་ཟམ་པ）即为今卡若区俄洛乡俄洛村，拉公在噶厦档案中写作སྐ་མདའ，即为今卡若区俄洛乡拉达村。牛粪沟非藏语译名，今属昌都市类乌齐县，位于恩达乡和瓦合乡之间。麻利、鼻奔山根、曲齿、中义沟等4处今属昌都市洛隆县。麻利（དམར་རི）为今马利乡马利村，鼻奔山根非藏语译名，当位于今马利乡夏叶村和洛隆旧宗所在地之间。曲齿（ཚོས་ཁྲི）即为今孜托镇确齿村，中义沟今名中亦松多（གྲུང་ཡས་སུམ་མདོ），今为中亦乡中亦松多村。索马郎、边坝、察罗松多、大窝、破寨子、大阪桥等6处今属昌都市边坝县。其中索马郎一地在实地调查中未能确认，当位于今中亦乡巴日囊村与拉孜乡拉孜村之间，边坝（དཔལ་འབར）即为今边坝乡边坝村，察罗松多（ཚོ་རག་སུམ་མདོ）即为今金岭乡擦诺克村，大窝、破寨子、大阪桥三处非藏语译名，当位于拉孜乡拉孜村与金岭乡阿拉多牧点之间，破寨子在噶厦档案中称作阿拉噶（ཨ་ལ་འགག），当位于今马利乡夏叶村和洛隆旧宗所在地之间，大阪桥当位于金岭乡阿拉多牧点与加贡乡加贡村之间。擦竹卡（ཚོ་རྩུ་ཁྲ）今属那曲市嘉黎县，位于鸽群乡擦曲哇村。

3. 拉里至前藏驿站考

拉里为今那曲市嘉黎县拉日村，前藏即拉萨。拉里至前藏，计程一千十里¹⁰⁴。从拉

102《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1982：235-238。

103《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1982：91。

104《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1982：238。

里至前藏包括拉里、前藏在内夜宿驿站 9 站和打尖之地 7 处¹⁰⁵。夜宿 9 站是拉里、山湾、宁多、江达、鹿马岭、乌苏江、墨竹工卡、德庆、前藏。山湾非藏语译名，噶厦档案中称作 ཀྲེལ，今属那曲市嘉黎县，即为今那曲市嘉黎县果列村。宁多、江达、鹿马岭等 3 站今属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宁多藏文写作 ཉིང་མདྲོ，噶厦档案中写作 ལྷ་ཏུ，即今娘蒲乡拉如村，江达（རྒྱ་མདའ་）即今江达乡江达村，鹿马岭（ལུ་མ་རི）即加兴乡奴玛日村。乌苏江、墨竹工卡 2 站今属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乌苏江（འདྲ་ཟེར་གུང་）即今如多乡乌斯江村，墨竹工卡（མཁའ་གྲོ་གུང་དཀར་）即今工卡镇工卡村。德庆（བདེ་ཆེན་）即今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德庆村。

拉里至前藏之间 7 处打尖地是阿咱、常多、过拉松多、顺达、堆达、仁进里、拉木、蔡里。阿咱（ཨ་ཙན་）即为今那曲市嘉黎县阿孜镇。常多、过拉松多、顺达三处位于今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境内，其中常多（གུམ་མདྲོ）在濯拉（ཁྲོ་ལ། 今写作楚拉）山口南面，濯拉是今工布江达县娘蒲乡和嘉黎县交界山口，过拉松多具体地望不清，当位于娘蒲乡和江达乡之间，顺达（ཉིང་མདའ་）位于今金达乡境内。堆达、仁进里 2 处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境，堆达在噶厦档案中写作 མཚོ་མོ་རག་，位于如多乡错木日啊一地，仁进里（རིན་ཆེན་སྒྲིང་）即今扎西岗乡仁庆林村。拉木（ལ་མོ་）今属拉萨市达孜区，即拉木乡拉木村。蔡里（ཚཱ་ལ་）今属拉萨市城关区，位于蔡公堂乡菜希村。

川藏道正式开辟后，藏历第十二饶迥土猴年（1728 年），七世达赖喇嘛因西藏地方局势不稳，奉雍正之命避险离开拉萨暂时移居泰宁。当时七世达赖喇嘛顺着清朝设立的驿站经嫩达（今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加玛乡境）、显巴塘（今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加兴乡境）、江达、擦曲卡（今那曲市嘉黎县境）、努孔拉（今昌都市边坝县境一山口）、朗吉衮（今昌都市边坝县境）、孜托（今昌都市洛隆县境）、昌都、香堆（今昌都市察雅县境）、蚌然堆（今昌都市芒康县邦达乡）、巴塘、理塘，然后抵达泰宁（今四川道孚县协德乡）¹⁰⁶。约在这一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也在清朝所设立的川藏官道驿站所在地或邻近地正式设立了对应的驿站（ས་རྒྱུགས་），为来往于川藏官道上的清朝和西藏地方官员、信使提供住宿、饮食服务，并负责安排支差乌拉等接送事宜。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噶厦资深秘书诺囊旺堆次仁编写的噶厦档案《导盲之眼》（ལོང་བའི་མིག་གྲུ་）¹⁰⁷ 中记录了拉萨至芒康之间设立的夜宿驿站 44 站，打尖地 3 处的地名：拉萨、德庆宿、墨竹宿、仁庆林可宿可

105《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招图略·西藏图考》，1982：98-101。

106 章嘉·若贝多杰：《第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2010：217-238。

107 诺囊旺堆次仁所编写的《导盲之眼》不曾公开出版，为笔者所存资料。

尖、乌斯江宿、错木热宿，以上 6 站设在今拉萨市辖境。奴玛日宿、岗木宿、江达宿、拉如宿、常多宿，以上 5 站设在今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境。果列宿、阿孜宿、拉日宿、擦曲味宿，以上 4 站设在今那曲市嘉黎县境。多度宿、加贡宿、阿拉多宿、查拉松多宿、乌坚达达宿、边坝宿、拉孜宿、巴日囊宿，以上 8 站设在今昌都市边坝县境。硕督宿、孜托宿、洛宗宿、夏叶桥宿、麻若宿，以上 5 站设在今昌都市洛隆县境。瓦合宿、恩达宿，以上 2 站设在今昌都市类乌齐县境。日悉尖、拉卧宿、玛达宿、昌都宿、蒙普宿、邦得宿，以上 6 站在今昌都市卡若区境内。巴岗宿、王卡宿、噶噶尖、昂地宿、香堆宿、热孜宿、阿孜宿，以上 7 站设在今昌都市察雅县境内。聂瓦宿、阿拉塘尖、玛库塘宿、芒康嘎宗，以上 4 站设在今昌都市芒康县境内。

上述 44 个驿站和 3 处打尖地名虽与清朝设立的驿站基本上相对应，但有 3 处不同。一是驿站地名新旧汉译不同，新译指当下各级政府文书、出版物中的译文，旧译指《西藏志·卫藏通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下称清史）中的地名。二是驿站地名不同，意即藏汉文中对同一个地方的称呼不同。三是驿站宿尖不同，意即噶厦档案所载夜宿地在清史中为打尖之地。

地名新旧汉译不同的有：仁庆林为仁进里、乌斯江为乌苏江、奴玛日为鹿马岭、阿孜为阿咱、拉日为拉里、擦曲味为擦竹卡，多度为多洞、加贡为甲贡、阿拉多为阿兰多、查拉松多为擦若松多、乌坚达为丹达、拉孜为拉子、巴日囊为巴里郎、硕督为硕般多、夏叶为嘉裕桥、麻若为麻利、昌都为察木多、蒙普为孟卜、邦得为包墩、巴岗为巴贡、阿孜为阿足等。

地名不同的有：拉萨为前藏、错木热为堆达、岗木为顺达、拉如为宁多、果列为山湾、曲齿为孜托、拉卧为拉贡、玛达为浪荡沟、香堆为乍丫、聂瓦为洛加宗、热孜为石板沟、玛库塘为黎树、江卡为芒康嘎宗等。

驿站宿尖不同的有：仁庆林可宿可尖为仁进里尖，阿孜宿为阿咱尖，擦曲味宿为擦竹卡尖，查拉松多宿为擦若松多尖，蒙普宿为孟卜尖等。

六、结语

依据上文所引汉文史料和藏文文献，结合考古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遗迹，对唐宋元明清时期连接西藏与中原的交通线路进行研究和考证，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 唐代从西藏中部，经索县、巴青、昌都、察雅、芒康，过金沙江，再经四川丹廓（即丹隆塘，邓柯）、青海玉树，前往长安或中原，是唐蕃古道的主要线路。

2. 从有限的藏文文献记载来看，宋代沿着唐蕃古道开展的民间贸易仍然活跃，中原的墨水、茶叶沿着唐蕃古道进入西藏。

3. 元代萨迦班智达、八思巴的出进藏路线和元朝在藏地设置的驿站地望，以及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赴元都时的出进藏路线基本相同。即从萨迦或拉萨出发，经当雄、索县、巴青、丁青、噶玛寺（昌都）、芒康，过金沙江，再经巴塘、玉树、丹底（青海化隆县境）、甘南、河州、临洮，前往元都或中原。元朝时期西藏通往中原的通道，是沿袭唐、宋时期故有的旧道，不存在新开辟通道。

4. 元朝在藏地设立的驿站，极大地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元朝治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代藏文史料盛赞“驿站的设立极大地方便了西藏与中原之间高僧、官吏、使者的往来行走。”

5. 明代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应永乐帝邀请赴南京时进出西藏路线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时期的路线。只是抵达噶玛寺（昌都）后，不再经过芒康，而是经昌都市江达县境，过金沙江，抵达丹隆塘（邓柯），再经玉树、甘南、河州，前往中原。这是连接西藏地方与中原的一条重要交通路线。同时，根据明代汉文文献记载，明朝时期西藏通往中原的通道还有多路，其中四川一路是出进藏的重要线路。前往明都献贡的西藏地方僧人和出使西藏的明廷使者多人便是途经四川一路。

6. 唐宋元明时期连接西藏与中原的通道在西藏境内走向是经藏北、芒康，或江达，过金沙江，再前往中原，不曾发现翻越唐古拉山的记载。

7. 清朝时期新形成的青藏道和川藏道是连接西藏和中原的两条新的重要交通线路。青藏道从藏北或青海翻越唐古拉山进出西藏。川藏道从四川成都，出打箭炉，从巴塘过金沙江，再从西藏芒康（江卡）入藏，抵达拉萨。川藏道远远繁忙于青藏道，是清代连接西藏与中原的主要通道，清朝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川藏道沿途均设有驿站。从川藏道功能而言，既是官道，又是商道（茶马古道）。川藏道在西藏境内的走向与元明时期稍有不同，此道从昌都不走藏北，而经洛隆、边坝、嘉黎、江达、墨竹、德庆，抵达拉萨。

◆ 巴桑旺堆 西藏大学特聘教授、西藏社科院研究员

A Study on the Routes Connecting Xiz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ang Wangdui

(Xizang University, Xiz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routes connecting Xiz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remains a perennial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Although scholars in China have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in recent decades, further verific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ecific routes in and out of Xizang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remain essential. By drawing on a wide range of historical sources—particularly Tibetan historical sources—in conjunction with Chinese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is paper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travel routes from the Tang to the Qing dynasties, identifying their specific trajectories and key locations. Methodologically, the study of the Tang-Tubo Ancient Road relies primarily on Chinese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Research on routes during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focuses on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supplemented by Chinese documents, while the analysis of Qing Dynasty routes is based on Chinese record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routes linking Xiz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roposing new insights to share with fellow scholars.

A Study of the Zhi Khro Mandala and Its Origins

Tamdrin Tseten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of Lanzhou University)

The Mandala of the One Hundred Peaceful and Wrathful Deities (*Zhi khro rigs brgya*) is the designated mandala for the Bardo of Dharmata as described in the renowned Tibetan Buddhist text, *Liberation Through Hearing in the Bardo* (*Bar do thos grol*), or the *Bardo Tödröl*. It constitutes a vital component of Tibetan philosophy of death and Bardo theory. The mandala in the *Bardo Tödröl* originates from the Forty-two Peaceful Deities and Fifty-eight Wrathful Deities found in the *Guhyagarbha Tantra*, which in turn traces its roots to several Buddhist Tantric classics circulating in the Tubo period during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Meanwhile, deities such as Samantabhadra, his consort, and the Six Munis are indigenous Tibetan innovations based on Buddhist theological logic, while groups like the Twenty-eight Ishvaris (*Dbang phyug ma*) represent deity clusters reconfigured by Tibetans. Consequently,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se deities demonstrate that during its transmission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o Tibetan culture, this mandala underwent continuous indigenization, adaptation, and innovation, making it an exemplary ca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